

第七章 文化、認同與學校教育

在本研究的一開始，提出了幾個問題：一、「在玩」青少女她們在特定的背景脈絡和社會關係中，究竟生產出什麼樣獨特的文化或生活方式？這些文化現象背後反映了哪些社會動力的交織作用？二、女孩們成為一個「在玩」青少女的認同形構過程為何？她們對自我的定位和對未來的理解是什麼？在這個動態的認同過程中，又展現了哪些抗拒意涵？三、從她們的邊緣經驗來看，是否可以為主流的學校教育體制帶來一些反省或啟發？準此，本章透過先前所呈現的青少女在不同面向的生活世界的經驗，進行以上問題的分析與討論，主要內容包含兩個部分，分別為「在玩」青少女的文化、認同，以及學校教育的反身性。

第一節 「在玩」青少女的文化與認同

本節先從「在玩」青少女在家庭、社區、學校、愛情四個場域的生活經驗，整理出她們所生產的主要文化形式，接著根據她們在學校裡頭所涉及的社會關係，分析她們成為一個「在玩」青少女的認同形構過程，最後討論這個過程背後所展現的抗拒意涵。

壹、「在玩」青少女的文化形式

文化是一套人們所共享的概念系統。「在玩」青少女因為相近的家庭背景、興趣喜好、人際網絡等，在互動過程逐漸發展出一套共享的文化和生活形式，成為她們詮釋情境、決定行動策略的主要依據。以下從她們在四個場域中的生活經驗，整理出她們所持有的八種文化概念，並且分析這些文化概念背後所隱含的階級、種族、性別等社會動力的意涵，及其盤錯交織的關係。

一、崇尚霸權式陽剛氣概

「在玩」青少女皆出身勞工階級家庭及社區，就她們周遭的生活型態而言，大量的體力勞動是主要的謀生方式，赤手空拳討生活也是普遍的生活型態。在這種情況底下，展現出越陽剛的氣質，越能為自己掙得生存的空間，獲得他人的尊重，因此，霸權性的陽剛氣概是被高度評價與讚賞的特質。即使是女孩，如果想要獲得他人尊敬、想要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想要在街頭爭得一席之地，很自然地

就會學習到以霸權式陽剛氣概來武裝自己。所以淑惠、小宣會表現出「強悍」、「敢衝」的剽悍女性形象，以建立她們在同儕間的威信，也會以兇狠勇猛的打架戰蹟作為炫耀的來源。淑惠在面對種族歧視或他人惡意的嘲笑與欺凌時，她的回應方式不是跑去向老師告狀或者忍氣吞聲地接受，而是使用打架這個最直接而「有效」的陽剛方式來保護自己。甚至，她們許多反學校文化的舉動，本身就是一種陽剛氣概的展現，例如和老師嗆聲，明目張膽地抽煙、喝酒、用藥，打架、勒索，組織自己的勢力、集結成黨等。在挑選男友的品味上，她們三人都不約而同地偏好具有霸權性陽剛氣概的男孩，混得越大尾的大哥越是她們心中理想的伴侶，因為這樣的男孩在她們的社群中才會獲得他人尊重，而且可以提供她們所需要的保護和各種有形無形的利益。在這種環境底下，霸權性陽剛氣概很自然地會由原先為了生存不得不發展出來的一種手段，轉變為她們所崇尚、欣賞的重要特質。

二、以愛情作為生活重心

和許多女孩研究的發現一樣，「在玩」青少年將愛情當成生活世界的重心，除去學校以外的生活，休閒娛樂的時間，她們大多都和男友在一起，她們也都將戀愛、結婚、生小孩，視為一條理所當然的人生道路。過往有些研究者¹因此將愛情解讀為女孩逃避外在現實世界的方式，認為女孩是藉由重視外表的吸引力、浪漫愛的幻想或婚姻，來逃避學校工作的乏味和黯淡無光的工作前景。Wexler也持有類似的觀點：「學生懷抱著（得自於學校）²不滿，於是將認同工作轉向神話（家務和性慾）的領域，以消解在學校裡頭認同生產的真實處境。（引自 Holland & Eisenhart, 1990: 50-51）不過，也有些後續研究³指出女人的確希冀愛情和親密感，可是，女孩對於異性戀愛情和婚姻的想法，並不是真的那麼浪漫、不切實際，她們也知道婚姻生活所要面臨的艱辛與挑戰，那麼為什麼女孩還是會將愛情與婚姻視為一種必要的選擇呢？關於愛情在女孩生活世界中的意義和功能究竟為何，Lees (1986)提出另外一個有趣的觀點，Lees 發現婚姻對於勞工階級女孩而言是一種經濟上的必需品，對那些不想要獨自一人過活或是單靠自己與艱困的現實生活搏鬥的勞工階級女孩而言，這是唯一的選擇。所以 Lees 認為勞工階級女孩

¹如 McRobbie (1978), Thomas (1980), Valli (1986)等。

² 括弧內的文字為 Holland 和 Eisenhart (1990: 51)加上去的解讀方式，以便放在青少年的脈絡下作討論。

³ 如 Lees (1986)和 Griffin (1985)。

們不是自由地選擇了愛情與婚姻，而是在有限的機會底下，只能仰賴愛情與婚姻作為未來的出路。將之對照到「在玩」青少女的情境脈絡，Lees 的說法可用來解釋愛情在她們生命中的意義和功能。「在玩」青少女拒絕相信學校教育的信念與價值，將街頭視為她們的成就來源，可是街角社會長期以來就是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社群，女孩在裡頭的定位僅是某個小伙子的女朋友。女孩不可能光靠自己的才能，不靠任何愛情連帶關係就進入這個以兄弟關係為主要集結方式的男性社群，甚至在幫派裡頭贏得重要的地位。相反地，如果女孩可以和裡頭的男孩談戀愛，就可以因此獲得金錢、保護、地位等利益。因此，和街角社會的男孩甚至大哥，發展異性戀愛情關係，理所當然地就成了一種必要的生存策略。再者，街角社會裡的勞工階級男孩，依然持有男生應該負責養家活口的觀念，因此，他們會負責養自己的女人，包括幫女朋友付錢、給女朋友零用錢、甚至提供住處，對於經濟狀況不佳的女孩而言，這的確提供了非常直接而立即的幫助，也讓她們產生一種對於未來婚姻生活的連結，想像結婚或許就是這種模式的延伸。由此觀之，「在玩」女孩會以愛情作為生活世界的重心，投注許多的精力與情感，甚至願意在愛情中忍受許多不公平的對待方式、性別歧視等文化，其實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因為街角社會的男朋友可能是她們在現實世界中，唯一可以依靠、可以夢想的途徑，也是為了保護自己、求生存的一種合理選擇。

三、順服刻板的性別文化

「在玩」青少女儘管有許多行為表現，都突破了傳統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與想像(例如敢於反抗權威、公開衝突、擁有豐富的情慾經驗、大膽談論性話題等)，偶爾也會批判父權體制對於女性的不公，但是由於她們所置身的街角社會仍是一個由勞工階級男性主導的社群，不可避免地，她們的性別文化也會受到整體社群文化的影響，充斥了性別刻板印象以及性別歧視。這些刻板、偏頗的性別文化包括了男生主要負責體力勞動和打架，只有男生才能參與決策，以及權力、利益的分配；女生的角色則被限定在服務男性和取悅男性之上，女性的價值透過外表和服務性功能而被界定。在愛情互動中，男生負責出錢養女生，擔任女生的保護者；可是女生必須扮演「好女孩」的角色，努力投注在傳統女性氣質的學習上。「在玩」的男生可以享有比較大的自由度；女生則不能太愛玩，想去哪裡玩必須先經過男友同意，而且傳統上被認為是女生「分內」的事情(如煮菜、打掃房間)都要會做，最好還能在婚前就學會迎合未來公婆對於一個「好媳婦」的期待。在性

道德方面，男孩的豐富情史是足堪誇耀的戰蹟；換做是女孩則變成隨便、敗德的象徵，女孩的性被「破」的論述機制所嚴密監控。此外，「在玩」女孩普遍持有強暴迷思，也有很高的比例曾經遭受男孩在性與肢體上的暴力對待。很明顯地，這些刻板、偏頗的性別文化，對「在玩」青少年而言是不利的，可是由於街角社會是她們獲得成就和驕傲的來源，所以她們大多時候還是會順服、接受這套刻板的性別文化。

四、集體追求刺激的玩樂文化

「愛玩」是這些「在玩」女孩用以界定自己的方式，足見「玩樂」在她們的生活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不過，她們的玩樂通常是以成群結黨的方式進行，而非個人主義式的物慾享樂；玩樂的方式追求危險、刺激，很多時候甚至是在挑戰道德法律的禁忌，和一般循規蹈矩的孩子有很大不同。由於這些「在玩」的孩子多半來自勞工階級家庭，生活中缺乏豐裕的經濟資源可以進行中產階級型態的個人式、物質上的享受，但是她們所不虞匱乏的是充裕的時間，和一大群處境相似（中輟、對學業不感興趣、家裡沒大人管、自主性高、零用錢有限）的同伴，所以她們的玩樂文化主要是以成群結隊的方式，從和朋友的互動中獲得樂趣。成群結黨地玩樂不但可以炒熱氣氛，也可以互相壯膽，集體做出一些平常個人不敢從事的行為，例如逾越社會法律的規範（偷竊、飆車、用藥）、鬼屋探險、上舞廳，遇到危險的狀況，更可以互相照應、彼此扶持。因此，成群結隊的玩樂文化不只反映了一種集體主義的人際互動原則（正好和學校所強調的個人主義式的競爭互相抵觸），可以解釋她們為何如此重視和朋友的關係，以及善於建立、積累街角社會的人脈。另一方面，這種成群結隊的玩樂方式還鼓勵了她們大步跨出原有的生活領域和活動範圍，以身體和感官去探索這個世界較為刺激、危險、有趣的面向，也讓她們得以暫時逃離現實生活的艱困處境，和學校生活的單調無聊。至於，她們的玩樂文化為何偏好從事破壞社會秩序、違反道德法紀的活動，也許和這些「在玩的」孩子曾經遭受大量的隱性階級傷害有關。文化取向的理論家如 Bettie (2003)、Ortner (1993, 1998) 等人，將階級界定為一種意義性的文化經濟的位置感或差異感，並且鼓勵吾人在日常生活經驗的各種差異分類中尋找階級，這些差異的分類包括了成功、金錢、性別、種族、價值觀、智力等。以「在玩」青少年少女的情況來說，她們雖然不會使用階級的語言來定義自己的社會位置，不過她們卻可以感受到自己所屬的是一種較為次等的文化、不為主流社會或學校教育

(中產階級的代表)所接納的文化。例如她們都出身自「不好」的家庭；經濟資源貧乏；在學校課業表現不佳；不符合一個好女孩應有的形象；淑惠的原住民身份更讓她有次人一等的感覺。因此，當她們在公共空間與其他社會位置較為優越的行動者互動時，她們會因為差異感和不如人感，持續地遭受階級的隱性傷害。為了平復階級情感的傷害，為了發洩她們對於這個社會的怒氣與所處社會位置的不滿，她們很有可能因此將中上階級人士所制訂出來，用來保護中產階級財產安全、生活秩序的法律道德，當成挑戰、嘲弄的對象。

五、高舉反學校文化

「在玩」青少年在學校之所以被標籤為問題學生的原因在於，她們都經常違反學校規定、對於學校所代表的官方權威表現出反抗、不順從的姿態。例如她們會和老師嗆聲，上課時睡覺或直接蹺課、刻意穿著不合規定的服裝儀容，組織小團體，集體破壞、對抗學校的秩序，在學校的公開場所抽煙、喝酒、用藥，甚至打人、勒索。「在玩」青少年會形成這種反抗學校的文化，一方面是因為學校是個以傳遞學術知識作為主要目的的場所，無奈她們對於這類抽象的理論性知識缺乏興趣。如果不想乖乖接受這樣的安排，就得想盡辦法破壞這些井然的秩序，為生活營造樂趣。再者，學業表現的失敗，會讓她們產生尊嚴的受挫和階級的恥辱感，為了彌補受挫的尊嚴，她們會以蔑視官方權威的方式，來表達對於學校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不認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學校文化（中產階級文化）和她們所熟悉的街頭文化（勞工階級文化），中間有著非常大的落差，導致她們無法認同學校的各種規範和安排。例如在街頭，她們重視關係性的、實用取向的生存智慧，鼓勵集體主義的文化；在學校，卻只有抽象的、理論的、學術方面的成就才會獲得肯定、鼓勵個人主義式的競爭。在街頭，她們自主性高、早就被當作成人看待；可是在學校，這個高度被規訓的場域裡頭，老師們仍然當她們是需要三申九誡的孩子，讚賞順從權威的行為。在學校，「好」女孩應該是被動、清純、不談戀愛、與性無關的，可是她們不但把愛情當成生活的重心，還特意展現誇張的女性氣質，大聲談論性事也不害躁。由於這些階級文化上的矛盾與衝突，導致「在玩」青少年們逐漸形成一股反學校的文化。

六、步入早熟的人生進程

Burton、Obeidallah 和 Allison (1996)指出成長於社會、經濟不利情境下的青

少年，對於青少年這個生命階段，會有不同於傳統「標準青少年時期」的發展。例如，許多居住在內城的非裔美人青少年，他們從小孩進入成人的過程，並沒有經過青少年這個轉換階段，因為他們從小就被期待必須擔負成人的責任，賺錢養家、照顧弟妹等，他們因此會產生「早熟的人生進程」(accelerated life course)，對於生命沒有太長遠的期待，很早就開始約會、交男女朋友。同樣地，這些「在玩」青少年也有生產類似的文化和價值。因為家裡經濟的困頓，父母忙於工作賺錢，她們很小就會自己打理三餐，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也要煩惱金錢的問題。國中的年紀她們就有賺錢謀生和獨立生活的能力，其扮演的角色和承擔的責任，無異於一個成人。在感情面向，她們從國中開始和男友發生性關係，也有同居的經驗，畢業後都想要盡快搬出去和男友一起組織小家庭，過著獨立、自主的生活。愛情、婚姻、生小孩這些代表成人地位的事務，對她們來說都不是遙遠的事情，她們和目前交往的男友，會談到婚姻、小孩的規劃，甚至已經在顧慮未來公婆的觀感，思慮關照的面向無異於一個成年女性。而且「大人能做的事情，她們也都能做」，對這些從小就被期待要靠自己長大的孩子來說，正是一種成功的象徵，代表她們已經獲致成人的地位，可以被當成一個大人看待。因此，傳統的「青少年」身心發展模式很難套用在她們身上。

七、重視實務取向的知識

「在玩」青少年對於學校傳授的抽象學術知識雖然興趣缺缺，但是她們卻很熱衷於學習街頭生存所必備的「實務性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這正是勞工階級所偏好的一種知識型態。勞工階級由於其所屬的工作性質，通常會包含可觀的實務運用特性，而工作事務的屬性又會影響當事者的思維方式，致使勞工階級成員容易認為「實務性知識」具有優越的價值。他們會強調知識應該在現實生活情境產生具體性的功能，這種功能在生活中得以被運用於解決立即性的問題(姜添輝，2002：244-245)。同樣地，「在玩」青少年每天在街頭闖蕩，隨時都會面臨許多生存的危機和難題，這時實務取向的知識遠比抽象高遠、無法立即應用的學術性知識，更能幫助她們應付每日生活中的挑戰，解決立即性的問題。例如每當身上缺錢時，她們必須知道賺錢的門路以及打工的方法，才能立即掙解經濟上的危機；想要在街頭闖出名號、建立威信，她們也需要學習如何吸收人馬、組織社群、設立規矩、領導群眾等技巧；為了建立人脈、打好關係，她們得懂得如何跟年長的大哥應酬往來、應對進退，如何很有手腕地去處理紛紛擾擾的人際糾

葛，妥善地經營人際關係。因此，導致她們形成重視實務性知識，貶抑、輕視中產階級所重視的學術性知識的傾向。也由於她們對於實務性知識的重視和追求，她們的確都練就了一身精明而世故的處世能力，普遍擁有豐富的生存智慧和社會經驗，迥異於中產階級孩子所積累的文化資本。

八、展現漢人中心的意識型態

三位「在玩」青少年的種族身份，雖然有閩南人，也有原住民，有主流優勢族群，也有邊緣弱勢族群，不過她們都同樣呈現出漢人中心的種族意識。以美如、小宣這兩位閩南人來說，她們很少意識到種族這個分類的存在。因為在台灣這個以漢人為主流的社會裡，她們體驗到自己是「正常」的，和別人是「相同」的，因此她們的種族身份反而隱匿不見，彷彿是一個不存在的分類。亦即，她們的種族意識是透過「相同化」和「正常化」的論述，建構出漢人身份等於標準、正常，而非漢人則是一種變異的語彙。至於淑惠雖然擁有原住民的血統，不過她從小成長於都市，置身於以漢人學生為主的學校，長期遭受漢人學生的嘲笑和歧視，以及漢人教師的「另眼看待」，讓她更加確信原住民身份是一種異類、可恥的象徵，因此，淑惠的種族意識受到主流優勢群體影響，同樣呈現出漢人中心的種族意識。在愛情中，她覺得原住民身份是個嚴重的「缺陷」，會讓自己身價貶值；在主流社會將皮膚白晰當成美麗象徵的審美標準底下，傳承自原住民的黑褐膚色，更讓她感到自卑；她拒絕和母親回山上探視親族，鄙棄她們的文化；試圖塗掉身份證上的原住民字樣等。可見，淑惠的種族意識已經完全被漢人所「同化」了。

貳、「在玩」青少年的認同形構

「認同」是指一個人置身於複雜、持續變化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對於自我的瞭解、詮釋和呈現。「認同形構」則是一種「成為某人」(becoming somebody)的創意方案，特別強調認同的動態過程。在這個過程裡頭，人們會主動地重新設計他們在階層化社會結構中的社會位置(Weiler, 2000: 4-5; Wexler, 1988)。放在本研究的脈絡裡，重點即在於探究三位女孩，究竟如何主動建構出自己是「在玩」青少年的認同形構過程，並據此選擇對應的行動策略。因此，本段先討論「在玩」青少年對於「在玩的」這個自我的建構從何而來，接著檢視這樣的認同形式，如何影響到她們在學校裡頭所花費的心力，以及未來的出路，最後再討論女孩們在認同形構過程中所展現的抗拒意涵。

一、對於自我的建構

Stuart Hall (1996: 4-5)曾指出所有的認同都是仰賴他者所建構，透過他者，個人才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知道自己屬於哪些而不屬於哪些群體。換言之，自我的建構常是透過與他人的差異感，與其他團體的對立關係所建立出來。因此，在探討「在玩」青少年的認同形構時，我們必須釐清這些女孩是透過哪幾組社會關係的對照，而將自己界定為「在玩」的女孩。首先，從字面上來看，「在玩」青少年會稱呼自己為「在玩的」，或是覺得自己「很愛玩」，正意味著有另一群「在讀書」、「愛讀書」的學生，和她們形成了對立關係，兩者之間的界線係以對於學校教育的認同與否作區分。再者，「在玩」青少年也很清楚知道自己跟那些「乖的女生」完全不同路，也對她們的文化價值不以為然，因此「在玩」青少年會刻意凸顯另類的性別氣質，以和那些「好女孩」、「乖乖女」做出區隔，所以第二組對立關係和她們的性別身份認同有很大的關係。

在第一組對立關係中，「在玩」的學生不認同學校教育的目的與價值，於是她們藉由玩樂、胡鬧、惹麻煩等方式，來打破學校教育的秩序，挑釁官方代表的權威。她們還發展出一套與學校完全相反的價值體系，例如蔑視努力用功讀書的價值，著力於追求刺激、有趣的生活方式。此外，她們也亟力累積自己的社會經驗，拓展自己的人際網絡，將心力投注在實務性知識和街頭生存智慧的學習，以便在街頭建立自己的成就和榮耀。相反地，「在讀書」的孩子認同學校教育的目的和價值，因此他們會聽話，順從學校的規範。由於他們生活的重心都放在學校上，因此生活非常單純，主要目標就是用功讀書，相信透過目前的努力，未來可以獲得更好的生活，因此願意忍受當前無趣、單調的生活，他們將眼光寄放在長遠的未來，而他們的成就就展現在學業成績和文憑。在第二組對立關係中，「在玩」青少年藉由化妝、在身體打洞、穿戴飾品這些另類的象徵資源，展現「誇張的女性氣質」。她們將生活重心放在愛情上，以擁有豐富的愛情經驗為傲，還會「公開展現性慾特質」，特意強調她們的性生理成熟、對於性的興趣，以宣示她們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女人，不是那種沒有談過戀愛或性經驗的小女生／乖乖女。此外，她們也有兇狠、強悍的一面，她們會採取「抗爭型陽剛氣概」（如打架、嗆老師、惹麻煩、違反校規）反抗學校權威。相反地，「乖乖女」會表現出適當的女性氣質，不過度性化也不過度陽剛，面對來自學校的權威，會乖巧、順服地接受。她們大多不敢交男朋友，也沒有性經驗，對身體和情慾的話題非常陌生。

以下用表 1 簡要地呈現這兩組社會關係所生產的對立式認同。

表 1 「在玩」青少年透過對立群體建構自我認同的途徑

(一) 以對於學校教育的認同與否作區分	
在玩的 / 愛玩的	在讀書的 / 愛讀書的 / 乖乖牌
不認同學校教育的目的和價值 社會經驗豐富、見過世面、人面廣 對課業不感興趣、經常蹺課 蔑視努力、單板無趣的生活，重視 當前享樂，追求刺激、變動、有趣 的生活 成就：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生存智慧 反學校文化、經常挑釁官方權威	認同學校教育的目的和價值 生活單純、以學校為重心 用功讀書 相信透過努力未來可以獲得更好的 生活、忍受無趣的生活、單調、日 復一日、穩定、逐步達成目標 成就：學業成績、文憑 聽話、順從、遵守學校規範
(二) 以性別特質作分野	
在玩女孩 / 壞女孩	好女孩 / 乖乖女
誇張的女性氣質 公開展現性慾特質 有豐富的愛情經驗、性經驗 有強悍、兇狠的一面	適當的女性氣質 表現出無性、清純的模樣 不敢交男友、沒有性經驗 大多是乖巧、順服的

從「在玩」青少年建構認同的過程可以發現：一，對立性認同的生產和她們在學校場域裡長期被貶低、被忽略的地位有關。由於學校是個以傳授學術性知識為主要目的的場所，所有篩選、評價的機制皆以此為準，對讀書沒有興趣的孩子，在學校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很自然會想要創造一種與眾不同、可以與主流文化相抗衡的認同形式，以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例如「在玩的」的孩子藉由敢於挑戰權威，可以顯示自己比那些聽話、順從的「乖乖牌」優越；把自己在外面的豐功偉業、見多識廣拿回教室當成誇耀的素材，可以反諷「乖乖牌」生活的單調、無趣；強調自己會打扮、交過許多男友、擁有豐富的情慾經驗，更可以「贏」過那些只會讀書、沒交過男友、不會打扮的「乖乖女」。藉著發展對抗性的認同，這些學業成就低落的孩子，得以建構出另一種為人所尊敬的自我，以彌補在學校

裡受挫的尊嚴，因此這種認同形式對她們而言是必要，也是一種反抗學校主流意識型態霸權的展現。

二，對立性的認同也和階級文化的對立、衝突有關。由於「在玩」青少年從她們的在地環境中（家庭、社區）中學習到一套勞工階級的文化（想要獲取成人地位、傳統女性化氣質、反抗權威的邏輯、蔑視學校教育等），同時也衝撞到以中產階級價值為導向的學校系統。因此，當她們在學校這個公共領域與其他優勢階級互動時，會感覺到格格不入的差異感，並且持續受到抱持中產階級信念的師長們所貶抑。為了平復這種階級情感的屈辱，也為了維持既有的文化與認同，「在玩」青少年會擷取她們所熟悉的階級、性別文化，作為反抗的素材。以第一組關係為例，「在玩」青少年不認可學校所提供的學術性知識（中產階級所熟悉的知識形式），反而轉向街頭尋求勞工階級所偏好的實務性知識以及生存智慧，以此作為成就的來源，可以說是挪用了（勞工）階級文化，來對抗學校的階級壓迫。就第二組關係來說，「在玩」青少年從她們的街頭文化中學習到，愈「女性化」的女生愈可以吸引街角社會男性成員的青睞，進而獲得她們所需要的愛情、保護和地位。因此，在她們的階級文化裡，一個優越的女生必須要能展現「誇張的女性特質」才算成功。另一方面，她們因為有著早熟的人生進程，也會比一般同年齡的女孩更早有性經驗，因此，不會避諱去討論身體和情慾的話題。只是這種勞工階級的性別文化剛好抵觸到學校的中產階級性別文化，而身體又是勞工階級女孩唯一可茲利用的素材，所以造成「在玩」青少年使用「性慾化的身體」和「誇張的女性氣質」，去對抗中產階級女孩所表現的「適當女性氣質」。在此，女孩的認同呈現出以性別文化對抗階級壓迫的反抗邏輯。

二、對於未來的理解

「在玩」青少年由於否定學校教育的價值，她們對於學校課業都抱持半放棄的心態，導致學業成績的低落，而經常性的反學校行為更讓她們遭受學校的懲處，造成操行成績不及格。因此，她們雖然知道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文憑，可以幫助她們未來找到更好的工作，可是一來，她們的成績不足以考到心目中理想的公立學校，二來，她們也缺乏就讀私立學校的經濟資本，所以，國中畢業後，她們大部分選擇離開學校，直接進入勞動市場工作，或以半工半讀的形式去唸職業學校。至於女孩們對於未來工作的規劃，她們都清楚地知道，以自己的學歷和文憑，頂多只能在不需要長期專業訓練和教育文憑的服務業工作。所以她們對於未來沒

有什麼過於高遠、不切實際的期待，大部分都會想要進入一些傳統女性化的行業，如美容美髮、幼保、服務生等，可以邊工作賺錢邊學習一技之長。而且，由於女孩們的家庭經濟情況不佳，從小經常感受到金錢的壓力，使得她們特別盼望畢業後可以趕快去工作賺錢，因為這代表她們終於可以經濟獨立，過著獨立自主的生活，不必再受制於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甚至有能力的協助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況。在對婚姻、母職的想像方面，由於女孩們很早就開始交男朋友，她們對於婚姻和小孩這些象徵成人地位的事務都早有心理準備，也很希望國中畢業後可以搬出家裡，和男友同居。因此，等她們一旦屆滿成年的年齡，或是等男友當兵回來，很有可能就會進入婚姻。由於她們選擇的男友/伴侶，大部分都是「在玩」的男孩，他們也同樣從事勞工階級工作，一份微薄的薪水不足以支撐整個家庭經濟的穩定，所以女孩們都有婚後還是要繼續工作賺錢養家的體認。

三、抗拒的意涵

在 Willis (1977)的研究中，勞工階級的小伙子們透過發展反學校行為，抗拒學校教育的文化意義，不過，由於這些叛逆的次文化剛好與工廠文化若合符節，使得小伙子發展反抗行為的經驗，變成在為將來從事較低階的工作做準備。因此，Willis 認為小伙子的抗拒事實上確保了社會再製的發生。那麼「在玩」青少女呢？她們透過何種方式進行抗拒？抗拒的結果究竟是提升或是再製其階級處境呢？根據前段認同形構的分析，「在玩」青少女和 Willis 的小伙子一樣，都是透過反學校文化來抗拒主流學校教育的霸權。她們拒絕成為乖乖牌，面對學校的不合理舉措，敢於挑釁老師、反抗權威。在教室裡，她們會表現出不專心、厭煩、無聊、冷漠的姿態，以讓老師知道她們的不滿和異議。此外，她們也會藉由強調學校不重視的面向（如組織派系、建立人脈、誇耀自己的社會經驗等）來抗拒學校只重視學術智識的單一意識型態。但是，「在玩」青少女和 Willis 的小伙子不同之處在於，她們除了要對抗以中產階級價值為導向的學校系統對她們的階級壓迫之外，還必須對抗中產階級所讚許的「好女孩」形象。因此，「在玩」青少女會投射出另一種女性形象：強悍、愛漂亮、重打扮、以愛情為生活重心、性早熟、準備進入婚姻。

抗拒的結果，就反學校文化來說，會導致她們無法獲得很高的文憑和學歷，只能進入低階的勞動市場工作。在《學習成為勞工》一書的時空脈絡底下，1970年代早期英國的低階勞動市場，所指的是需要大量體力勞動的血汗工廠，不過自

從 1970 年代後期以來，全球化資本主義已經劇烈地改變了世界先進工業國家的生活本質。已開發工業國家的工廠陸續外移，造成需要大量體力的勞動工作隨之驟減，或者改用更低價的外籍勞工來取代，而新型態的服務性產業則激增。換言之，千禧年的勞工階級年輕人所要進入的勞動市場，是過去被視為「女性化」(feminine)的產業，如零售和服務業，這種「新勞工階級」的工作特徵為薪資低廉、工時彈性、無工會保障(Aronowitz, 2004; Kenway & Kraack, 2004)。因此，某方面來說，「在玩」青少年在國中畢業後，就進入美容美髮、服務業等低階勞動市場，成為服務生或美容美髮助理之類的「新勞工階級」，的確是「再製」了她們原先的社會位置。不過從樂觀的角度來看，這種經濟結構的轉型，也為不愛讀書的孩子製造了很多有利的機會。女孩們不必經過長期的專業訓練或擁有很高的學歷，就可以直接就業，從工作中累積經驗和專業能力。而且，服務業重視員工外表的吸引力、女性化特質（例如善於溝通、應對進退）(Cho, 2000; Choi, 2005)，正是「在玩」青少年所專精擅長，也樂於主動投注精力的工作。因此，女孩也有可能從中累積專業能力，而獲得晉升中產階級的機會。女孩的抗拒未必導致如 Willis 所預言的悲觀再製的下場。

就「誇張的女性氣質」而言，女孩重視男友、愛情，以及性早熟的特質，使得她們打算畢業後就盡快和男友同居或結婚，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再製了女性以婚姻、母職為生活重心的傳統女性化角色。不過，女孩會想要盡快結婚或和男友搬出去同居的理由，並不是因為她們對於婚姻有浪漫和不切實際的幻想，相反地，她們清楚地知道，未來要面對的是嚴苛的現實考驗，經過理性的計算，她們發現兩個人一起共同為生活打拼總比一個人孤身奮戰更來得有保障(例如淑惠男友現在在當兵，淑惠可以先賺錢養他；等以後男友退伍找到工作後，再換他賺錢給淑惠去讀書)，也發現男性不管在整體的社會結構或街角社會的脈絡底下，通常可以因為男性的身份而獲得較多的資源(例如美如假使和阿達結婚，阿達的父母會準備一棟房子給他們住；小宣假使和超哥結婚，未來可以繼承超哥家裡的便當店，或者成為角頭老大的老婆)，因此和男性形成共生同盟(結婚或同居)的關係，對她們而言，反而是一種階級向上流動的途徑。可見，當這些比較沒有資源的勞工階級女孩，在面對階級跟性別的雙重壓迫時，她們在現實生活裡面往往會與男性形成共生體，跟男性攜手聯盟以對抗經濟上的艱難處境(階級壓迫)，而這也是她們之所以願意忍受勞工階級男性所歷史建構出來的性別歧視和暴力的原因。不過，這樣的舉動很容易被中上階級的女性主義者解讀為一種「再製」

傳統女性角色、缺乏女性主體意識的表現。實際上，這是生活在底層的勞工階級女孩，在她們的社會處境底下，不得不使用的一種向上爬升的生存策略，可以算是一種能動性的展現。況且，即使結婚後，女孩們也都認為自己還是要賺錢養家，對自己的專業生涯有一定的期許，從這個角度來看，她們已經在鬆動傳統勞工階級男主外 女主內的分工型態，也可視為女性意識的萌芽。所以，儘管 Giroux (1983) 認為只有能改善人類生活的抗爭行為才可以被稱之為抗拒，但在真實生活中，抗拒往往不是一種全有或全無的狀態，抗拒的結果也不可能是全然的成功或悲觀的再製。更多時候，抗拒是一種在石頭瓦礫中，拼命尋找縫隙向上生長的狀態，某些時候可能得調適現實、接受現況，某些時候也可能成功地鑽出一條活路。在這個尋找出路的過程中，抗拒與再製的作用同時都在發生。

第二節 學校教育的反身性

Fine 和 Rosenberg (1983: 257) 曾言：「對於社會機構的批判性觀點，通常可以從那些被放逐在外的人身上得到，這也許是那些被放逐者的觀點通常會被貶低為偏差或是被噤聲的原因」。而三位「在玩」青少年的經驗，正可以提供我們一個方式，以理解這些邊緣的學生如何以複雜的方式經驗到教育的失敗，以便從新的面向思考和重構主流學校教育的模式。因此，本節主要透過「在玩」青少年在學校被邊緣化的經驗，希望能夠提出一些值得主流教育體系反思的議題。

壹、反省教師本身所抱持的中產階級價值觀

從「在玩」青少年的文化和認同可以發現，「在玩」青少年的文化與價值深受其勞工階級背景的影響，可是學校卻是一個由中產階級價值觀所主導的公共場域，因此，這些女孩在學校裡，很容易會因為她們不合乎「主流」、「正常」的行徑，而被師長標籤為「問題學生」。「在玩」青少年們的文化與價值在學校長期受到貶抑、無法獲得成就感，自然會形成對立性的認同，或者向學校以外的街頭尋求成就的來源。在這個過程中，教師身為學校機制的代理者，顯然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教師所抱持的價值觀，教師如何看待這些具有非主流文化特性的孩子，會嚴重影響到她們待在學校裡的意願和處境。

可惜的是，根據「在玩」青少年與教師接觸的經驗顯示，大部分教師都很少反省自己的價值是否隱藏著中產階級的偏見或是種族、性別的歧視，也很容易根

據自己的認知去評判、解讀這些不符合主流價值孩子的行為和文化形式。例如有些教師認為女生愛漂亮、談戀愛就是變壞的徵兆；女生和男生發生性關係，是女生吃虧；聽話服從的才是好學生；服裝儀容一定要符合學校的規定；頭髮不可以剪得過於特異炫目等。這些教師之所以會抱持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在成為教師的社會化過程中，已經吸納了中上階級的文化與思維模式，再加上校方和家長經常會以學生的智育表現和生活常規，作為評鑑好老師的標準，使得教師所認定的好學生特質，也往往具備中上階級的特質，例如遵守秩序、尊敬教師權威、用功、聽話服從等，並且因而排斥勞工階級的語言、行為與思維模式（李莉菁，2001；姜添輝，2002：309-328）。長期下來，教師假設缺乏自省的能力，很容易會忽略勞工階級的文化形式也有許多珍貴且值得敬佩之處。例如這些「在玩」青少年，她們在艱困的環境中成長，卻因此發展出比一般中產階級孩子更多元的能力：她們都在很小的年紀就可以獨立生活、自立自強，她們非常地精明世故、善於處理人情世故、具有現實感，懂得為自己籌畫安排人生的道路、具備解決問題的技巧、以及領導能力等，這些能力和價值都需要被學校老師所看見和肯定。

此外，我還發現當教師們談起這類「問題學生」時，有些人會因為心疼這些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從「家庭」獲得的資源比較少，因此將矛頭指向這些孩子的家長，指責他們的父母不夠盡責、情緒不成熟、不關心小孩等。

師：孩子會有問題，父母親的責任感是比較低的。這些有問題的孩子，她們的家庭功能，我碰到的兩個，她們家庭功能是很薄弱的（淑惠師 940630）。

師：我覺得這種偏差行為個案的爸媽也常是這種不成熟的行為模式，她們的爸媽也常常是這樣的行為模式，所以其實這些個案的爸媽自己的行為本身也常是不成熟，她還沒有體會到，她對這個小孩，這個生命是責任，然後就一直推。我們班家長有 20%左右是需要再教育的，他們沒有很重視小孩受教育的權力，沒有很關心小孩成長的部分，我覺得那個真的是失職的部分耶，其實真的是失職耶（小宣師 940630）！

從教師們為這些孩子打抱不平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們基本上都能夠同理、體諒問題學生在學校之所以成為問題學生，大部分都不是他們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他們的家庭背景有異於一般主流中產階級的學生。可是，假設教師只是將責怪

的焦點從學生身上，轉移到學生家長身上，那麼等於還是停留在個人的層次，沒有設身處地去理解弱勢家庭的辛苦，也沒有看見形成弱勢家庭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勞工階級家長無法提供小孩很多的資源，固然是一個既定的事實，但是，身為中產階級的教師卻忽略了：有時間心力照顧小孩、陪伴小孩成長，這些事都必須在特定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底下才有可能達成。假設一個家庭連三餐溫飽都有問題，那麼父母賺錢都忙不過來了，如何可能談到陪伴小孩、照顧小孩；在強大的經濟壓力和惡劣的勞動條件底下，人們的情緒也勢必充滿緊張和壓力，又如何能和小孩和顏悅色地談心事、溝通討論。誠如夏林清（1999）所言：「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必須面對來自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孩子，如果不能對各種家庭變化形式中的人的痛苦經驗，進行有啟發性先知式的理解，那麼一個教育工作者就只能著力於既存現況的維持作用」。因此，教師們需要經常反思，自身的思維模式是否有獨厚中產階級學生、貶抑勞工階級家庭、文化的傾向，以避免教學變成再製霸權的工具。

貳、反省學校的規訓與懲罰機制

上段提到，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會以既有的中產階級價值觀，對學生進行篩選，言行舉止不合「正常」規格的學生（通常是勞工階級的孩子），很快會被辨認標示為「問題學生」，然後學校會透過一系列規訓與懲罰的機制，將這類孩子的地位邊緣化，比較嚴重的甚至會被推出校園。「在玩」青少女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感受到學校對她們的偏見與不友善，漸漸地離學校越來越遠。因此，教育工作者很有必要反省這套篩選、排除學生的機制，是否合乎教育的本質，以及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孩子的受教權是否有被完整地保障。首先，就學校辨識「問題學生」的過程而言，教師會將「在玩」青少女標示為「問題少女」，通常是因為她們的行為舉止不符合中產階級所期待的「適當女性氣質」（例如在外表上動手腳、交男朋友、有性經驗），而且有些教師還會對於這套經過長期經驗累積下來的專業鑑別能力感到自信得意。只是，這種鑑別方式不只反映了教師不自覺的中產階級偏見，還暴露出教師在處理學校事務時，習慣以僵化固定、只具表面效度的分類系統，將學生快速地分門別類，並依此決定後續的處置方式。這樣做對老師來說，好處是可以很有效率地處理學校大小事務，看不見的負面影響卻是無法看見每個孩子的獨特性，以及每個故事背後的情境脈絡。例如校方在處理小宣的

中輟問題時，發現小宣原來都住在男朋友家，於是便片面主觀認定：小宣是受到男友不好的影響，才會不來上學，只有將他們拆散，小宣才能回到「好學生」、「好女孩」的軌道。為了強迫他們分手，校方將小宣通報為「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條例」的受害者，希望透過公權力阻止他們繼續交往，後來反而引發更多風波。站在學校的立場，教師知道未成年的小宣與成年人發生性關係，的確有通報的責任，可是校方對整件事情的處理過程卻有欠周全。校方沒有考慮小宣和小宣媽媽的想法，就採取一種很粗暴的方式，企圖直接規範、管制她和男友之間的關係。因此，導致小宣後來對學校師長抱持一種防衛的心態，不願再將自己的情感狀態和老師分享。此外，學校老師還曾在全班面前要求小宣剪掉精心彩繪的指甲；為了警惕其他女學生不要過早發生性行為，而公開流傳小宣已經拿過一個小孩的謠言等。這些帶有羞辱、貶抑意味的行徑，都嚴重地挫傷了一個不符合中產階級性別氣質女孩的自尊心，使得她在學校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

再者，影響女孩就學權益最大的舉措，莫過於中輟生的通報、復學處理機制。從小宣和淑惠的中輟復學經驗可以發現一個現象：中輟很容易、復學卻很難。學生只要三天沒到校，就會被通報為中輟生，之後如果想復學，必須先通過觀察期，可是觀察期間的行為規範不僅嚴苛繁瑣，連天數的長短也是由校方自行拿捏，最後導致復學變成一件漫長且困難的事情。以校方的立場來說，他們也許是考量到其他大多數學生的利益，才會不希望這些「在玩」的學生回到學校。但是在國民教育階段，上學不僅是每個學生的義務也是她們的權利，校方這種「柔性拒絕」的作法，還是嚴重損害了她們的受教權。而且，在辦理復學手續期間，學校禁止女孩們進入教室，將她們留置在輔導處或訓導處，卻沒有多餘的人力和師資可以為她們進行另類的補救教學或心理輔導，只好任由她們在那兒發呆、聊天、睡覺，不僅虛耗女孩們的時間，這個處置本身也缺乏積極性的教育意義。整體而言，在復學的過程中，學校所關切、檢核的重點，大部分都在於女孩們能不能適應學校的作息、按時來校上課、遵守學校的服裝儀容規定、不惹麻煩等外在的行為規範，可是對於女孩們的心理、情緒層面，卻缺乏充份的支持與輔導，也沒有針對這些中輟後復學的孩子設計一些銜接式的課程，幫助她們重新適應學校。在這種情形下，原本立意良善的中輟復學輔導機制，反而變成學生返校復學的冷卻劑，經過這些重重關卡後，學生原本想要復學的動力可能都早已冷卻。由這些例子顯示，學校的規訓與懲罰機制會對學生的身心造成亟大的影響，也會影響學生日後的去留，學校在運用這些法定權威時，必須更為戒慎、小心，不要讓這些外在行為規

範的要求，變相成為將孩子趕出校門的推手。

參、反省課程與教學背後的意識型態霸權

「在玩」青少年對於學校課程抱持冷漠與敵意，一方面和學校課程沒有納入她們的生活經驗與需求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學校的課程與教學，沒有融入批判性多元文化主義⁴的精神，使得她們透過教育反而會感覺自己的文化是低劣、不如人的，因此對於學校知識產生疏離感。例如，在家庭的意識型態方面，國內的教科書只會呈現中產階級模式的家戶型態，很少看見另類家戶模式的存在，使得許多孩子因為自己的家戶模式不是理想中的「好家庭」，不喜歡自己的家、不認同自己的家。在階級方面，全國勞動者家長聯盟、北市與全國教師會曾經聯合檢視教科書中的勞動人權，結果發現中小學教科書充滿著培養廉價勞工的意識型態；鼓勵學生漠視、貶低勞動階級家長的職業；迴避勞資關係的矛盾和衝突；也漠視勞工應有的勞動基本權和相關的勞動法令（胡慕情，2007）。長期接受這種具有階級偏見的教育內容，很有可能使得勞動階級出身的孩子無法看見家庭困境背後的結構性因素，而將過錯怪罪在「沒有用」的父母身上，更沒辦法學習到如何在未來的工作職場中爭取自己的權益。無怪乎，美如會怨恨失業的父親、淑惠會以媽媽的工作為恥，甚至因此鄙棄自己的家庭，和她們在教育中所接收到的大量扭曲訊息都有關聯。

在性別方面，「在玩」青少年老早就進入情愛的世界，探索性與身體的慾望，可是學校基於不鼓勵學生談戀愛的立場，教師不但很少和學生討論愛情裡頭的性別權力關係，西街國中輔導室還以推動「真愛值得等待」作為主要的工作重點。這種教條式的情感教育，一來和「在玩」青少年的真實世界有很大的差距，無法務實地面對她們的處境和需求；二來，真愛教育宣導婚前守貞、婚後要對伴侶一生忠實的看法，一旦成為學校的主流性別教育政策，形同在貶抑、指責那些已有婚前性行為的「在玩」青少年，加強了她們是性道德墮落的一群的刻板印象，反而會讓她們陷入更大的困境。再者，由於成人持有國中學生不應有性的預設，所以學校裡頭根本沒有性教育的課程，青少年們的性知識大部分都是從 A 書、A 片中習得。導致她們雖然已有性的體驗，談起性的話題也很大膽開放，但當我問

⁴ 批判性多元文化主義強調要對主流文化之霸權加以質疑，對於特定族群之主體位置及價值應加以肯認。詳細內涵請參見游美惠（2001）。

起她們知不知道安全期的算法、保險套與避孕藥的正確使用方式，她們卻都流露出一臉茫然的樣子。當我問她們如果我要幫她們上課的話，她們最有興趣的主題會是什麼，她們的回答也都不約而同地回答：「性教育」。可見，「在玩」青少年對於性與身體的知識有著非常強烈的需求，相關課程卻付之闕如，更不用提那些有關性與愛裡頭的權力關係議題，如強暴迷思、身體自主權、貞操迷思、雙重標準等，更不太可能在課堂上被討論，無怪乎青少年對於性與愛的態度會有那麼多刻板和偏頗的想法。此外，同性戀在學校課程中也是一個禁忌的話題，「在玩」青少年雖然有許多同志好友，可是她們對於同性戀卻有很多疑惑和刻板印象，代表師長很少在課堂上和她們討論這些議題。有一次，小帥因為自己的性取向和導師發生衝突，最後輔導主任竟然建議她爸媽帶她去看精神科醫生，以診斷小帥是不是真的一如導師的觀察。從這個事件的處理過程，可以看出教師本身的性別意識非常薄弱，不僅沒有做到維護同志學生的受教權益和隱私，還有將同志學生「病理化」的傾向。再度印證了學校的課程與教學有多麼缺乏性別平等教育與性教育的面向。

在種族部分，由於台灣的多元文化教育總是以添加性的方式，出現在某一單元或科目，沒有全面檢討教科書中隱含的漢族中心主義，導致原住民教育往往流於異族文化的展示場。漢人教師根據這樣的教材授課，不只容易缺乏對於主流漢人位置的自我反省和批判，也會對原住民學生造成另一形式的壓迫。例如淑惠在課程上常被老師要求要介紹自己的文化給同學們認識，教師也許認為這是善意的舉動，但是卻忽略了多元文化現象背後隱藏極不平衡的權力關係。在教師沒有帶領學生共同檢視這些權力關係，也沒有處理試圖去改變場域中的權力結構之前（例如漢族學生對於淑惠的歧視和言語羞辱），這些「善意」的舉措，對淑惠來說，毋寧是一種公開的羞辱，也導致她對自己的種族身份益發不能認同。以上這些課程與教學的缺失，都是造成「在玩」青少年在學校這個場域，持續遭受性別、種族、階級傷害的原因。